

中國大陸的區域經濟發展

耿慶武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商學院副教授
兼研究部主任)

摘要

本文擬對大陸經濟發展的區域化的理論基礎與政經環境作一定性研究。首先自區域經濟發展理論出發，綜合研討大陸經濟發展已顯現的區域化趨勢，以及大陸學者對未來大陸經濟區域化的研究結果，再配以本研究自身的觀察與分析，而對大陸未來經濟發展的區域化趨勢作一較系統分析與展望。大陸自一九七八年以來經濟發展的特色，是實行了差異性頗大的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綜觀中國歷史、民族與文化特性、以及自然地理環境的限制，並考慮過去二十年經濟成長的經驗與區域經濟發展的趨勢，本研究認為大陸未來的經濟成長，極有可能出現以區域經濟圈為「成長極」的多頭發展趨勢。本文為作者研究大陸區域經濟發展的中文論文之一，較著重理論上的定性分析；至若大陸經濟區域圈的劃分、區域經濟圈國際化程度及與亞太地區其他經濟體的關係，已於另文中做較數量化的分析與展望。

關鍵詞：區域經濟、區域經濟發展理論、大陸區域化趨勢、大都會經濟圈

* * *

一、前言

中國大陸擁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及遼闊且地理環境複雜的領土。大陸的人文與地理特性，因地域分佈的不同以及山川地形的分割而差異頗大。大陸的面積中絕大部分為山地、高原、盆地與丘陵，平原僅佔總面積的 12% 弱。以中國大陸為生存空間的十二億多人口中，又因種族、居住地域、方言及文化風俗的不同，而在經濟生產與消費的行為與形態上有衆多的差異。例如，在一九九六年底，中國大陸有三十個省級行政區，其中有五個為少數民族自治區（廣西壯族、寧夏回族、新疆維吾爾族、及內蒙古、西藏），另有十四個省中有行政等級較低的（州縣級）「民族自治區」的存在。

因地域遼闊、自然資源分佈不均衡、各地區經濟及技術發展程度差距過大、市場經濟及人民商業意識淡薄、以及市場機制不健全等客觀事實，中國大陸自古迄今從未

曾，且在可見之未來，亦將很難形成一個同質劃一的（homogeneous）的經濟體（市場）。中國大陸的經濟市場，迄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開始時，基本上是由小、多、且又分散的集市^①所集結成的、具有強烈區域特性、且區域間相互關連性不大的農業經濟圈。這些多、雜且分散的小經濟市場，被中央政府或統治者，運用非經濟方法（例如政治攤派、武力徵收、中央強制計畫等）或行政手段，且絕大多數不透過市場力量運作，而「統一」成所謂的中國大陸國民經濟體（National Economy of China）。自一九七八年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後迄今，大陸的生產力擴充與經濟市場化的趨向明顯可見。然而，此一經濟市場化的趨勢迄今僅二十年，各種市場的建立及發展，因人文及社會制度的慣性及法律制度建設的緩慢，仍屬幼年期，也是一個事實。大陸各省（地區）間長期以來，甚至於現今仍有的生產力與所得的巨大差距，證明了大陸仍頗為欠缺讓財貨與生產要素在國內自由流動及交換的條件。中國大陸在世紀之交及可見的未來，將仍是世界上自然地理、人口資源、及經濟社會差異最大的國家之一^②。

大陸在一九八〇年代前中共政府的集權體制統治下，中央政府擁有全部資源配置與經濟利益分配的權力，地方政府及各種企業僅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或附屬單位。這種以中央政府集權為主的計畫經濟體制，在推進某些主要產業或國防工業的發展上，以及大規模資本的累積與形成上，曾發揮一定的作用〔例如大陸的軍事核子、飛彈、航太（Aerospace）、傳統武器等產業的發展〕。但這種中央集權式的計畫經濟體系，卻始終無法解決兩個難題：(1) 大陸因幅員廣大及地區間發展極不平衡，各地區執行中央決策的時效及能力差距頗大；此種地區性的屬於經濟以外的外在條件（Externality）或外生變數（Exogenous Variables）如自然環境、基礎建設、風俗教育、社會發展程度、體制等，使得中央統一的經濟政策，在不同的區域，產生差距極大的結果。(2) 各地方政府參與經濟決策與經濟活動的誘因（incentives）及效力（effectiveness），因中央政策的偏頗（例如頭痛醫頭式的區域救急措施）、政治的考量（如西藏政經的嚴密控制）、及不切實際的官僚行政（例如一些有時效性的區域投資項目的審批一拖經年，使區域性經濟利益流失），而無法達成原政策設計的目標，進而產生頗大的區域性差異。

所以即使是「統一性」最強的中央總體經濟政策與經濟法規在中國大陸實際執行時，其所得到的效果與結果，亦因區域的不同而各異。因此將中國大陸視為一個單一的經濟體（市場）來敘述或研究，除了在經濟分析方法論上流於過度簡化與粗糙外，所得的結論亦無法提供工商業個體與投資單位在大陸從事商務活動的實質規劃與評估。大部分早年投資大陸的跨國公司蒙受長期巨額的虧損，似應是缺乏對大陸區域經濟與市場的區域性之了解，而籠統的將大陸視為單一市場（或將大陸中央視為唯一的業務

註① 中國大陸的經濟迄一九七〇年代末，仍是以小市集（即 William Skinner 研究清朝末年大陸農村所發現的以十到二十村落的住民所構成的定期市場圈）為單元所集結成的區域性甚強的農村經濟。見渡邊利夫，「虛妄的中國經濟大國論」，中央公論，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註② 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小組，開源與節約—中國自然資源與人力資源的潛力與對策（北京：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商談對象)所致。

本文為作者研究中國大陸區域經濟一系列論文之一。文中擬首先扼要敘述近年來經濟學理論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一些重要結果，然後綜合研討大陸經濟發展已顯現的區域化趨勢，以及大陸學者對未來大陸經濟區域化的研究結果，再配以本研究自身的觀察與分析，而對大陸未來經濟發展的區域化趨勢作一較系統的定性研究與分析。至若影響大陸未來區域經濟發展至鉅的區域經濟發展政策部分，已在作者其他文獻中有較詳細討論^③，故僅擬在本文中扼要敘述有關影響未來區域經濟發展的部分。此外，對於大陸區域經濟圈的形成及其國際化程度與未來趨勢，即與亞太地區其他經濟體的關係與整合之可能，已於作者的另二篇論文中做較完整的數量化分析^④。讀者或將發現，若同時參考本文與該二文，或許對作者對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之研究有一較完整的認識。

二、區域經濟發展的理論基礎

中國大陸經過自一九七八年開始一連串的經濟制度改革，已經基本上自中央集權及指令分配性的計畫經濟逐漸邁向市場經濟。但是，中國大陸整體而論太大也太複雜，未來的經濟發展雖可依過去二十年來經濟的連續高速成長期中已建立的基礎及規律自生地(*endogenously*)發展；但事實上將有很大部分與世界的政經環境、中國大陸未來政治與社會的穩定、以及大陸中央所採行的經濟發展策略與實際施行的政策息息相關。也就是說，大陸未來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有很大一部分將取決於許多人為的、制度上的、以及世界經貿環境上的外生因素(*Exogenous Factors*)。這些外生因素中，又以大陸未來所採行的經濟發展策略影響最大。因此，欲討論大陸未來經濟發展趨勢，必需先研究大陸未來的發展政策。

一般而言，經濟發展政策的效果、適用性與可行性，可由人類過去經驗的累積中獲得。但是，人類迄今所累積的政經知識與人文歷史，並無成功治理一個十二億人口的單一市場經濟體系的經驗。以大陸人口之多、地域之廣、區域差異之大，事實上無法奢想以一個完整的單一市場經濟體來研究與規劃。畢竟，不同的區域，因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同，產業與市場結構的互異，需要不同的發展策略。因此將大陸視為一個單一經濟體，而直接應用現有的經濟發展理論與模型來分析及預測其未來經濟發展趨勢，

註③ 耿慶武C.W. Kenneth Keng,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tus, Strategy and Prospects*, Research monograph,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97; 該書修正後的中文版，耿慶武（2000），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將於二〇〇〇年底由聯經出版公司在台灣出版。其中的第一部份：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策略研究，共有六章討論與分析大陸區域經濟發展政策。該書蒐集、參考或分析的有關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之中英文學術研究文獻近千份。本研究僅引述作者在該書中所獲之重要研究結果。有興趣讀者或可逕行參考該書所列的原始文獻，本研究不擬花費篇幅贅述。

註④ 耿慶武（2000b），「中國大陸經濟區域劃分及發展趨勢」，中國大陸研究，第四十三卷第六期，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及耿慶武（1999c），「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與國際化」，*Working Paper AP9932*, Faculty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似乎流於過度簡化與粗糙。

古典經濟發展理論以比較靜態（Comparative Statics^⑤）方法分析一經濟體內各區域的長期均衡狀態（Long-run Equilibrium 或 Steady State）下的經濟成長時認為，就長期而言，因為長期市場行為近似完全競爭，因此高成長區域的經濟發展成果最終自然會流向低成長區域（即所謂的擴散效果 Spill-over Effect），而使得同一經濟體內的各區域最終達成相同的經濟成長。此一結論成立的充分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是「完全競爭市場」與「長期」。顯而易見的，此二條件乃基於使用比較靜態方法從事分析時的需要而必需如此假設，但是在現實世界中卻不易求證。

何謂「長期」？古典經濟學中，一般定義「長期」為一個經濟體系中所有可變動的因素均完成調整而趨於穩定的均衡狀態（Equilibrium State）。因此，經濟學中的長期並不是以時間來衡量的「長程」或「長時期」（Long-term），而是一種假設的理想狀態。在現實中或可視為一種「期望」或一個「理想目標」。「完全競爭市場」假設所有參與市場交易的經濟單位均有完整的信息（perfect information），所有的市場交易均可視為立即完成的交易（instantaneous transactions），而且交易成本可低得不必考慮。因此可見「完全競爭市場」更是一理論上的假想（Hypothesis），在現實經濟中，因為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參與市場交易的經濟單位所掌握的資訊之不同（Information Asymmetry），而使得現實世界中的市場無法如理論假設般的完美。因此古典經濟發展理論並不能有效地協助我們推導大陸未來（例如自今至二〇二〇年）各區域經濟成長程度是否趨同（即區域差異因市場力量的運作而逐漸消失）的問題。

近年來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 Economics）所新發展出的內生成長理論（Endogenous Growth Theory）指出，一個國家內的不同區域的經濟成長，因為各區域的起始狀態（initial condition）的不同、產業在不同發展時期有不同的投入與產出比率（例如，規模報酬遞增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以及受市場不完全競爭的影響，而可能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有不同的經濟成長速度。因為廠商（Firms，經濟生產的基本單位）的合併與產業的整合，可使生產成本大為降低；而產業與市場的集中，更可使各種市場中的交易成本降低，因而使得廠商或產業在某一段成長時期享受到規模報酬遞增^⑥。所以經濟行為自然趨向於各種資源與生產要素、技術與商務服務、以及各種市場高度集中的區域。若一國家內的某些區域的產業結構與市場發展在經濟成長開始時即與其他地區有顯著的差異，則因為動態經濟行為在市場力量的連續運作下向較高度開發地區繼續不斷地集中，而使得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內，呈現繁榮的地區更加繁榮的現象。換言之，一個國家內部某些地區因地理與經濟結構差異的存在，而使得其往後

註⑤ 比較靜態分析方法，簡言之，為一比較一狀態（例如現今狀態 Present State）與另一狀態（例如最終狀態 Final State）間的各種性質，再試圖推論或解釋此二狀態間的可能關係。此與動態分析方法不同，動態分析著重於推導一狀態至另一狀態的變化過程。

註⑥ 美國紐約的金融服務業、矽谷的資訊產業、五大湖南岸的汽車產業、台灣的科學園區、以及大陸的經濟特區均是在現實中長期保持較其他地區有較高的經濟成長的「區域化」例子。美國近年來股票市場的長期保持繁榮，亦與世界資金大量且持續地流入美國（因而使得美國銀行可長期維持低真實利率），互為因果關係。此亦可解釋為世界流動資金「區域化」（長期向美國集中）的現象。

的經濟發展自然呈現區域化（向某些區域集中）的現象。

中國大陸過去二十年來的經濟成長的區域化趨勢，除了是受政府所採行的梯度區域發展策略（譬如沿海傾斜策略、經濟特區政策）影響的結果外，有很大部份應該是因為逐漸茁壯的市場力量，引導各種經濟行為向較高度開發地區集中的結果。引導這種經濟資源向較高度開發的地區集中的現象的原動力，應該是各種經濟單位在市場運作下對自身經濟效益追逐的結果。當然，這種經濟資源及交易向某些地區集中的現象，亦包括因市場與法律制度不健全而產生的各種投機行為在內。例如，幾乎大陸所有的省份，包括最貧窮的青海、寧夏與貴州等省在內，均在上海及深圳設有投資公司，以其省內建設極需的資本，在上海與深圳的股票市場中尋求較高的財務投資報酬。這種資源向較高度開發市場集中的現象，雖然是一個經濟成長的過程而非一種終極結果，但畢竟可能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在這段過程中，吾人所觀察到的現象，即是經濟市場與產業結構的區域化現象。中國大陸四大經濟特區的高速發展、沿海十四港口開放城市的急起直追、以及九大都會經濟圈的逐漸形成即是明顯的例證^⑦。

三、大陸經濟區域化的趨勢

中國大陸未來政治及社會的穩定，很顯然的必需建立在經濟的持續成長上。而大陸欲保持其經濟的持續成長，勢必需大幅提升經濟效率，方能在不使生態環境更惡化的情況下，有效地利用極有限的自然資源，及早調整產業結構以加速工業化。同時亦需積極地參與國際貿易及產業分工，以使工商及製造業迅速發展，俾便儘快培養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與產品，以便在國際市場賺取足夠的外匯來支付供給未來十五億人口提升經濟生活所必需的進口的糧食、能源、礦產、技術及其他商品與服務。而達成此目的的必要條件是經濟的市場化與自由化。

經濟的自由化在總體層次包括中央政府的經濟事權的下放以及各種中央管制（禁制）的解除（鬆綁）；未來大陸中央政府主管的經濟事權似將限於全國性或跨區域性，而將區域性經濟事權完全授予區域政府掌理。此即一些研究在展望大陸未來經濟成長時所作的導引大陸未來經濟臻於高成長的「經濟分權與管制鬆綁」構思（Decentralization and Deregulation Scenario）^⑧。大陸中央政府經濟事權的下放以及各種中央管制的

註⑦ 大陸形成中的九個大都會經濟圈為：吉黑（長春—哈爾濱）、瀋大（瀋陽—大連）、京津冀（北京—天津—石家莊）、濟青（濟南—青島）、長江下游（南京—揚州—合肥）、大上海（上海—吳錫—蘇州—杭州—寧波）、珠江三角洲（廣州—深圳—珠海）、湘鄂贛（武漢—長沙—南昌—九江）和成渝（成都—重慶）。詳註④引文：耿慶武（1999b）。

註⑧ C. W. Kenneth Keng, "China's Economic Prospects in the New Century," in A. J. Nathan et al edited, *Dilemmas of Reform in Jiang Zemin's China*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7), pp. 171~212; C. W. Kenneth Keng, "An Economic China: A Win-win Strategy for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5:9, October 1998, pp. 182~21; 及耿慶武（1999a），「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展望」，*Working Paper AP9931*, Faculty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Victoria，即將在台灣發表。

解除，將導致區域產業及區域^⑨市場的加速成長與茁壯。

(一) 經濟市場化與區域化趨勢

經濟的自由化在個體（微觀）層次則包括區域經濟事權的自主、產業的投入（要素）與產出（產品）的市場化、區域市場與經濟活動的自由化與國際化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種產業的投入要素市場（如資金、人力、地產、技術、資訊等市場）與各種商品及服務市場的自由化。大陸當局近年來所施行的逐漸解除農產品與礦產的價格管制，以及一九九八年宣佈的外銷貿易管制的改革，都是產品市場與經濟活動的自由化與國際化的具體政策。但是大陸政府在生產要素市場方面的控制仍然大量的存在。例如，戶口制度改革的緩慢，使得一般人力無法自由流動；政府體系、教育與研究體系、國營企業、以及其他類似政府（semi-public）機構（例如醫院）的人事升遷制度與員工薪金制度因受中央政府的節制而過份僵化，使得大批高級技術與管理人才同酬卻不同工，而無法發揮應有的生產力；都是使人力市場的自由化進度緩慢的原因。另外，大陸對於土地使用權轉讓的嚴格管制、城市土地產權的國有等土地政策，亦使得土地的供給與需求被扭曲，而無法達到市場調節與優化（Optimization）。此外，大陸金融體系對於一般資金供給（貸款）的混亂與隨機性，股票、各種財務及期貨市場的不健全，政府對於利率及匯率的嚴格管制，均使得資本要素的自由流動與交易距理想狀態遙遠。這些例證雖然指出大陸各種市場在目前自由化程度的不足，但亦同時指出大陸未來各種市場自由化的巨大空間，以及未來因自由化所帶動的生產力成長的巨大潛力。

未來當大陸中央逐漸放寬對地方經濟事權的控制後，市場機能將導引社會上的所有經濟活動趨向建立較低交易成本的產業與市場結構。因為城市已有的基礎建設（交通、通訊、環保等）與工商服務（金融、法律、貿易等）將使得在城市中的所有經濟行為的交易成本降低，因而產生較高的比較利益。此在市場機能運作下，各種經濟資源及經濟活動如投資、生產及消費等，將自然地向具地緣關係的城市集中，區域市場與區域產業結構應運而生。這些以城市為中心的區域性產業與區域市場的形成和交互運作的結果，即是以地緣關係相近的城市群所形成的區域經濟（產業與市場）結構的出現。這些以大都會為中心的經濟圈形成的最主要關鍵，在於其圈內的經濟單位因為可集約使用基礎設施與有效利用各種圈內資源與服務，而使得在圈內的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較與圈外交易者為低。圈內的經濟單位與圈外或國際的經濟交易活動將僅在有比較利益時才發生。因此產業的自由化與市場化的自然結果，即是經濟的區域化。

罔顧市場規律的「大一統式」或「齊頭式」的經濟發展政策，除了將導致中國大陸所有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上升外，更會造成地區間投資與消費行為的扭曲，以及經

^⑨ 見本文第二節與第三節前部，以及 D. Ray, *Development Econom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apter 3 and Chapter 4, pp. 47~132。

濟生產與分配在區域間的不公。而且，中央將需花費大批的經濟資源與高昂的政治代價來監督及控制地區間的經濟行為，以執行這些「齊頭式」的經濟發展政策。尤有甚者，因為「大一統式」的經濟發展方式是依賴中央的分配與管制（例如產業的全國佈局），因此區域與區域間的合作關係並非建立在區域市場間的公平交易與互利的合作基礎上。在中央計畫式的「全國佈局」模式下，區間的合作關係的互替性（Substitutability）遠大於互餘性（Complimentability）^⑩，因此區域間為爭奪資源與市場而產生的經濟磨擦與矛盾，很可能成為全國社會及政治不穩的導火線（例如市場封鎖、諸侯經濟等）。故就長遠而言，強調「大一統式」經濟發展的結果，非但不能加速大陸的經濟成長，更有可能成為加速中國大陸分裂的潛伏因素。反觀區域經濟發展的結果：各區經濟自主發展，區間經濟行為僅在互惠（具比較利益）時發生，如此非但消弭區域間矛盾與可能的分裂原因於無形，更可使區域與區域間的經濟合作關係因互餘性的存在，而同生共榮，更形緊密。區域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優點與特性，即是各種資源因自由市場機能的運作，而達到最高利用效率。這些區域效率的累積，將直接促成全國總體經濟的高速成長。

（二）自然資源限制與經濟區域化趨勢

未來大陸經濟發展將受人口、平原面積、糧食、能源及生態的嚴厲限制，因此經濟發展策略的制定，必得考慮實際可獲得的經濟資源以及地理條件限制的因素。未來大陸經濟發展的速度，將取決於其區域經濟發展政策制定的是非「務實」。「全國佈局」式的產業發展策略，非但無法解決大陸廣大人口在複雜地理條件下經濟發展的需要，更將因大量區間運輸需要的陸路交通網佔用稀有的平原、消耗大量儲量及產量俱已嫌不足的石油，終而使得大陸經濟成長速度減緩。

中國大陸的人口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以上，但可耕地卻僅佔世界的 7%。就平均每人擁有的自然資源而言，大陸是世界上最貧乏的國家之一^⑪。大陸的人均農地面積僅為世界各國平均的 28%，人均可供放牧的草原面積少於世界平均的一半，人均森林及野地面積僅為世界平均的 15%，而人均水資源僅為世界平均的三分之一。此外，包括煤儲量在內，大陸的人均能源儲量亦遠較世界各國平均為低。如果不積極提升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與各種產業的生產技術，中國大陸未來的經濟發展與人民福祉的增加，將因自然資源的貧乏而受到嚴酷的限制。

註⑩ 互替性與互餘性原為經濟學術語，在應用到對局理論（Game Theory）時，可解釋二競爭者間的競爭與合作的關係。互替性高的競爭關係，因可互為替代，故一方得之另一方必失之，因此趨向「零和」。但若二者為互餘時，則有共同獲益（「雙贏」）的可能。

註⑪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2: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World Bank, *Clear Water, Blue Skies: China's New Environment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2a). 本節所引用的資料與結果在耿慶武（2000，見註③引文），第二部分第七章：「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極限」中有詳細的註解與分析，有興趣讀者或可逕行參考該書所列的原始文獻。

雖然多數研究指出^⑫，若大陸積極開放市場以使經濟自由化、產業結構全球化，以及透過產業的國際分工與物資在國際市場的交換，應可解決大部分自然資源貧乏的問題；但是大陸極有限的平原面積，卻是一個無法透過國際市場的交易來解決的天然限制。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與必然結果是城市化與工業化，而平原土地卻是發展此二者的基本要素。大陸有限的平原，除了限制農業部門的擴充外，更會限制城市及全國陸路交通網的發展。

大陸未來的城市化與工業化，將使得城市用地需求巨幅增加，因而將導致土地價格（或地租）上漲速度快於其他物價上漲速度。人均（平原）土地的稀少以及土地相對價格的高漲，將直接影響大陸當局建設全國性長距離、高運量的陸路交通網的成本及財政能力。因此，大陸未來經濟發展的一個不易解決的、因自然資源貧乏而形成的瓶頸，即是如何集約利用大陸有限的平原，來容納與支持未來成長為十五億以上人口經濟成長所需的城市化與工業化。有限的平原將使得大陸未來經濟發展所需的工、商、交通、住宅等用地的相對價格高漲，而影響到幾乎所有大陸國內產業部門的生產成本。因此，若不有效解決平原稀少問題，則平原稀少問題將會直接減低大陸未來國內產業的成長速度及國際競爭力，終而減緩長期總體經濟成長的能力及速度。

大陸未來四分之一世紀的經濟成長的最終極限，並非一般論者直覺上認為的糧食與能源的供給限制，因為這些物資的國內供給不足可經由國際市場的交換與調節來解決。但是可供未來城市化與工商業化的平原面積的限制及平原使用的高相對成本問題，卻無法經由國際市場交易來解決。為了經濟利用稀少的平原，大陸未來建設類似美國的全國性高運量陸路交通網的可行性極低。事實上，因為地理地形與可用平原面積的限制，大陸未來的經濟發展的形態與地區產業結構，將無法模仿美國式的「全國佈局」，而需採用類似日本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以減少因產業全國佈局而必需的長程高運量區際運輸網（長途公路與鐵路網）所佔用的平原面積。因此，中國大陸為達成未來高經濟成長目標，似別無他法，而唯有集約使用資源地發展經濟（市場與產業）結構相對獨立、以地緣相關城市群為中心的區域性的經濟圈（即「大都會經濟圈」）一途^⑬。因此，就集約利用貧乏的人均自然資源而言，大陸未來應將趨向積極發展區域性的經濟圈。

註^⑫ World Bank, *China 2020: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7). World Bank, *At China's Table: Food Security Options*, 1997b 及 C. W. Kenneth Keng, "China's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Regionalization," in R.E. Bedeski and J. A. Schofield edited,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in the Asia-Pacific Area* (Victoria: Western Geographical Press, 1997), pp. 151~178。耿慶武 (1999a)，「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展望」，*Working Paper AP9931*，與耿慶武 (1999d)，「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極限」，*Working Paper AP9934*, Faculty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註^⑬ 此為大陸經濟學家王建首先提出，見王建，「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總體思路」，中國的產業、地區發展與外資的作用（北京：國家計委宏觀經濟學會，一九九七年）。耿慶武 (1997, 1999) 更進一步研究並強化該「思路」的理論基礎與實證研究。

(三) 國營企業改革與地方化趨勢

中國大陸的三十餘萬家國營企業，將在新世紀初年中，陸續轉型^⑩。姑且不論此一影響近億城市國營企業員工及其家人的國營企業改革，對大陸政治及社會的衝擊，是否會影響中共繼續執政的基礎；國營企業改革的一個非常深遠的影響與無可否認的結果將是大陸中央對此批傳統上為中共政權三大基礎群衆^⑪之一的國營企業員工的影響力及掌控力，逐漸轉移到地方政府及非國營企業（如三資及私營企業或地方性共有企業）手中。就經濟及市場結構而言，此一無法改變的國營企業的改革與地方化趨勢，將成為另一波的中央對地方的「放權讓利」趨勢。在未來數年至十數年中，將因大批國營企業的喪失其原有的政府保護：財政補貼、低利甚或無償貸款、對生產要素市場的控制、對產品市場的獨佔權利等等，而持續地強化大陸國內市場的自由競爭及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終而引導全面的資源配置的優化與刺激各種產業的生產力的提升。因為中央控制的解禁以及市場競爭的壓力，改革後的國營企業，自然將先以保全其所在地的市場為主。改革後的國營企業因員工和企業本身的利益與地方利益相互一致^⑫，無可避免地將加速融入地方政經社會，因而將導引區域市場及區域產業結構的加速形成。

就大陸政經體制而言，國營企業的民營化（非國營化）及地方化趨勢，將代表大陸中央對企業影響及操控力的式微。代之而來的，將是以企業本身利益為主的市場競爭。因此，各地方政府為爭取企業及市場，應將非常可能制定具有區域特性的經濟發展政策，如地區性的投資優惠、租稅減免、協助貸款、及各種非價格競爭之優惠或鼓勵投資政策（如協助獲取土地、各種手續簡化、水電優惠等），以吸引國營企業的加速改革與再投資。此一趨勢的自然結果，將是國營企業與地方經濟結構的整合、地區市場的形成、以及地方政經勢力的增強。

(四) 體制改革與經濟區域化趨勢

1. 金融體制改革與區域經濟

在一九九七年六月完稿的研究中^⑬，作者曾明白研判指出：

註^⑩ 不論是一九九六年開始的「九五計畫」或一九九七年秋召開的「中共十五大」，均將國有企業改革列為首要任務之一。

註^⑪ 支持中共政權（或可被中共確實掌握）的三大群衆基礎為：軍隊、黨員與政府員工、以及國有企業職工。

註^⑫ 大陸當前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環節即是建立以地區（省或數個縣市）為主理單位的社會福利（醫療、養老等等）制度。例如，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制度將於一九九九年底前開使全面推廣實施以地方政府負責主辦及管理所有所在地的企業、機關、事業、社會團體等城鎮單位的員工以及所在地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國家公務員和離休（不上班但仍保有原職務的待遇與福利）與退休的人員的醫療保險。此一制度的實施，明白指出了未來中國大陸醫療福利制度改革的地方化趨勢。

註^⑬ 見註^③引文：耿慶武（2000），第一部份：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策略研究的第五章：「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策略展望」。該部分研究在一九九七年六月完成後曾報請委託研究機構備查，並於同年十一月在美國賓州大學召開的北美華人社會科學家協會的年會與全美中國研究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的年會上發表。

由大陸中國人民銀行主導，各政策性銀行和各商業銀行等金融信貸機構共同組成的「金融清算中心」在北京成立，為大陸建立現代化全國金融市場奠定必要電腦及通訊的硬體基礎。「金融清算中心」雖表面上為一為會員銀行提供效率性服務，以降低各會員銀行間轉賬及資金清償等業務的交易成本的中央服務機構；但其另一更重要的制度上的功能卻是：中國人民銀行（或其他國家機構），自此可透過「金融清算中心」的電腦系統，即時「線上」（On-line）掌握及監測大陸境內幾乎所有資金流動的數量及其來龍去脈。為大陸中央銀行（亦即政府）掌控大陸金融市場，制定貨幣政策提供準確且即時的資訊。此對於防範與化解類似東南亞諸國在一九九七年遭遇的突發性或外生型金融風暴，將具一定程度的效果。

事實上，早在一九八九年，大陸國務院即已批准人民銀行設立金融衛星通訊網及全大陸主要銀行間的電腦聯網系統。但是隨著大陸經濟規模的成長，銀行業務的急劇發展，原有的銀行間以通訊及票據交換及清償為主的系統，已難以適應大陸金融業的日常營業需要。再加上大陸中央財金當局，在近年實際操作宏觀調控政策時，所發生的金融資訊不明，無法即時瞭解及掌握資金流動的情況，而使得「金融清算中心」加速於一九九七年內成立。當然，一九九七年開始的東南亞金融風暴，亦有催化劑的功效。

「金融清算中心」的成立，雖然為大陸中央金融管理當局，提供了一即時且有效的監測大陸金融體系內，短期資金流動的工具。但是，距離反映各地區各種市場實際供需情況及物價變動方向，與掌握分析各地工商業發展及經濟成長所需的中長期資金的供給與需求，卻無甚幫助。而後者，才是貨幣政策決策者最需要的資訊。以大陸諸地區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同，以及市場發展程度的巨大差異，在北京的財政部及中國人民銀行甚難以類似「金融清算中心」的高度中央集中單位，來有效且即時地收集和分析各地區的市場與經濟實況，進而制定妥善適合各地區經濟發展的資金調度、物價控制及宏觀調控政策，以充分支援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及提供各地區工商業有效的金融服務。因此一個區域性較強，且較分散（Decentralized）的中央銀行系統，在最近的將來，應在大陸出現。

雖然迄今形勢尚未明顯，但在未來隨著大都會經濟圈的形成，跨省且以服務大地區為目的的區域性中央銀行或「人民銀行分行」（類似美國的地區聯邦儲備銀行 Federal Reserve Banks），應極有可能產生。此將為因應未來在大陸自然形成的「大都會經濟圈」所發展的地區經貿市場的需求而生，亦為管理、服務及保障地區性金融市場的正常運作及效率所必需。唯其成立的時機，似將視大陸未來國內政治的穩定，個別區域的工商社會發展的順利與否及成熟度而定。北京財經領導人的智慧，及其幕僚的專業知識，也將直接影響此一趨勢的速度。

距以上研究所作的預測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大陸中央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中旬宣佈重組具中央銀行功能的「中國人民銀行」：撤銷以行政區域劃分的省（直轄市）級人民銀行分行，而新成立九個跨省級的分行。雖然，如衆所周知的，省（直轄市）級人民銀行的撤銷可自體制上根本擺脫地方行政機構干預國家金融管理與貨幣政策的一

慣性及有效性，因此防弊重於開創；但是九大地區中央銀行分行的設立，卻充分考慮到大陸未來區域經濟發展的趨勢，以及區域性金融管理與資金調適的重要，而頗具開創性與前瞻性。此外攸關區域經濟發展至鉅的省級外匯管理局，亦將隨人民銀行的改制而撤銷，而由跨省的區域性外匯管理局替代。

中國大陸新設立的九大區域中央銀行分行分別為：瀋陽、天津、濟南、上海、廣州、南京、武漢、成都與西安。大陸新設立的九個區域中央銀行分行，除西安分行外，基本上與本研究所強調的九大都會經濟圈相吻合。瀋陽、天津、濟南、上海及廣州五大分行基本上分別對應了本研究強調的已具大都會經濟圈雛形的五大沿海經濟圈：「瀋大」、「京津」、「濟青」、「大上海」、與「珠江三角洲」；其中瀋陽分行並含括吉黑經濟圈。而南京、武漢與成都分行分別對應著「長江下游」、「湘鄂贛」與「成渝」大都會經濟圈；其中成都分行亦監管西南地區的金融業務。未包含在九大都會經濟圈的山西、陝西及西北地區省份，則由設在陝西的西安分行管轄。顯而易見的，在改革開放二十年後，大陸中央基本上已開始了解與重視區域經濟在總體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居的關鍵地位，而將中國大陸的金融體制改革與區域經濟發展趨勢併同考慮。就政治經濟體制設計而言，經濟區域與行政區的分離，正是自體制上解決「地方主義」或「諸侯經濟」的根本之道。

2. 「軍企分離」政策與區域經濟

一九九八年的另一影響深遠的體制改革：「軍企分離」政策或許是著眼於防範軍方利用種種特權經商，破壞市場規律，而達到消極的「防弊」效果。但是由政治經濟體制設計觀之，「軍企分離」正是積極地自體制上將軍隊地方化（即所謂的「軍地掛勾」）的可能性連根拔除。軍隊不得經營企業，自然無與地方利益相結合的誘因與機會；由中央而非地方負責軍隊的經濟支援，則地方自然無法影響軍隊。此一制度性的改革，在短期，似乎無助於區域經濟的加速形成；但若考慮政治層面後，即可發現，大陸中央在去掉「軍地掛勾」的顧忌後，將更積極進行對地方的經濟事權的鬆綁。此外，中國大陸「軍區」的設置一向是以軍事與國家安全來考量，較少考慮地方行政區域因素，因此應該大致與九個大都會經濟圈的形成無必然的關係。但是若較仔細觀察，不難發現，「大軍區」的劃分似與九個大都會經濟圈亦有些「偶合」的部分。例如濟南軍區與「濟青」經濟圈、南京軍區與「長江下游」經濟圈、廣州軍區與「珠江三角洲」經濟圈、武漢軍區與「湘鄂贛」經濟圈、成都軍區與「成渝」經濟圈、瀋陽軍區與「瀋大」經濟圈等等。這些非因制度上或功能上之因果關係而導致的「偶合」，自然無多少政治經濟上的意義，但至少似可看出九大都會經濟圈的地位與在整個中國大陸的軍事與安全上居重要地位的「大軍區」的關係。

(五) 未來經濟發展政策與區域化趨勢

大陸當局為了維持持續且穩健的經濟成長，必得積極提升其產業結構與經濟效率，方能在相對貧乏的自然資源限制下，生產足夠具競爭力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換取滿足未來十五億人口經濟成長巨大需要的糧食、能源、原料與技術。但是因為有限的平原

面積與石油資源的限制，大陸在未來實際上無法建設一高運量的全國陸路交通網，以供「全國佈局、區域分工」的運輸需求；而必需依賴各經濟區分別發展相對上較獨立的生產與消費結構，以及開展區域間的協作，以帶動大陸未來的經濟發展。此一經濟發展區域化的事實需要與趨勢，將驅使大陸當局積極擬訂與實施區域經濟發展政策。

大陸未來經濟發展長期策略與中短期政策的制定^⑩，應將在已有的經驗及基礎上，較過去近二十年的「改革開放」時代，更為有系統，並且更具經驗及信心。基本上將以「全面開放」策略替代過去的「區域開放」策略；以「產業傾斜」策略替代過去的「區域傾斜」策略；以制度及法律規範替代過去隨機性高的「行政授權」；並強調市場的自然規律並以總體（財政及貨幣）政策來管理全大陸的經濟。大陸中央似應將逐漸不再直接介入地方性的區域發展，而以總體經濟政策與產業發展政策，透過市場機能來引導地方的發展方向。

未來大陸區域經濟發展的秩序，將受大陸正在及即將建立的財稅制度、銀行制度、及各種全國性財貨市場的健全程度及效率所影響。而未來大陸區域經濟發展的速度，將取決於區域經濟發展政策制定的成功與否。「全國佈局」式的產業發展策略，非但將無法解決大陸廣大人口在複雜地理條件下經濟發展的需要，更將佔用稀有的平原、消耗大量產量及儲量俱已嫌不足的石油，使得大陸經濟成長速度減緩。因此，中央集權計畫的「全國佈局、區域分工」計畫式的產業政策，未來在大陸全面實行的可能性極低。

事實上，大陸中央政府已經授予地方政府許多傳統上為中央所積極掌控的權力與責任。譬如，糧食儲備與平衡一向為大陸中央執行社會主義政策與控制通貨膨脹的極重要的政策目標。但是自一九九五年起，大陸中央已將此權力授予地方（省）政府掌管。又譬如，培養高級人才及掌控（分發）其就業，一向為大陸中央所重視，但自一九九八年始，大部份原由中央部會負責的大學，已就地轉由地方政府管理^⑪。此外，各種社會安全制度如養老、失業、醫療、救濟等亦正在或逐漸在由完全中央負責轉為地方負責。既然這些傳統上被認作「社會主義支柱」的糧食平衡、人才培養、與社會安全等權力與責任均可轉為地方負責，則未來其他各種經濟事權的地方化亦不足為奇了。

四、大陸區域經濟發展展望

(一) 大陸未來區域經濟發展策略

未來大陸經濟發展將受人口、平原面積、糧食、能源及生態的嚴厲限制，因此區域經濟發展策略的制定，必得考慮實際經濟及地理條件的因素。各種文獻裏建議的大陸區域性發展的可能雖然衆多，但實際可行的策略選擇卻仍待研究。沿江、沿線（海岸線、交通線）、沿邊（邊界）、環渤海灣等區域發展「戰略」，實際上是對未來發展的一些臆測與構思，並非成熟且配套的策略。大都會經濟圈區域經濟發展策略，則

註^⑩ 對於大陸未來採行的經濟發展政策的探討，請參考註^③引文：耿慶武（2000），第一部分第五章第三節。

註^⑪ 自一九九八年開始，大陸新成立的教育部僅直接管轄43所大學，其他傳統上屬於中央部會管轄的93所大專院校中的91所，均已就地劃歸地方政府管轄。

為大陸未來的經濟發展提供一較務實可行（有日本前例可循）、且較樂觀的區域發展方向；但其成功的基礎及形成的速度，卻仍將建立在未來大陸政治及社會發展的結果上。然而，大陸在未來出現高度城市化的都會經濟圈，畢竟將為一非常自然及可能的經濟發展趨勢。因應該趨勢，大陸當局在未來制定及施行大都會經濟圈發展策略，似比其他區域發展策略較有可能及較為可行。

事實上，大陸未來經濟成長的最佳策略與結果，應該是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發展這些「大都會經濟圈」。如此，非但可集約利用大陸相對貧乏的自然資源，更可有效地利用發展一些區域所累積的人才、知識與經驗，逐步地去發展其他尚未發展的區域。此種因實際需要而訂定的區域發展次序，非但可優化經濟資源的利用，更可享受規模經濟之利。因為以大陸市場規模之大，若同時齊頭發展所有區域，則因各區域在資本市場上的競爭所造成的投資沖銷效果，以及實物市場上的需求劇增所引起的通貨膨脹，都將造成無法解決的經濟發展瓶頸，破壞或扭曲市場秩序，而終將迫使大陸經濟規劃者，不得不回到逐步且漸進式的、以市場需求來決定優先次序的、分段的、分層次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

例如，當沿海地區投資報酬率因地價、工資的高升以及原料及市場的競爭而下降時，大陸中部地區諸經濟開發區，自然將成為大陸下一波經濟成長的主力區域。齊頭式的全面「自由化」，只會在根本不具備自由市場機能的大陸衆多且相對的較獨立的經濟區域，造成資源的惡性競爭。此非但無法將資源分配到最需要處，反而造成呆滯、浪費、及極不協調的地區及產業的畸形發展。因而終將導致經濟供需由地區性的失調，而引起的全面性的無法協調，最後造成實物市場及資金市場均供需失調的通貨膨脹。大陸過去二次以總體性的「解禁」政策，以及中央向地方全面「放權讓利」所造成的「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慘痛經驗，以及蘇聯解體後迄今的經濟混亂，基本上均是因市場制度未建立即全面解禁的結果^②。因此分階段、分層次、且以市場力量推動的區域經濟發展政策，應是大陸未來經濟發展的最佳策略與最可行方式，也是大陸未來在各種主客觀條件限制下，最有可能的經濟發展趨勢。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既然已經有五十年（一九四九～一九九九）的「統一」歷史，而且已經發展出有利現代經濟發展的統一語文、單一貨幣、關稅、財政、法律、教育等制度與系統，以及各種技術性的規格與標準^③，實際上已經建立了有利於現代經濟發展的基本制度架構（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破除此一架構的經濟成本及對大陸的十二億華人的精神與社會損失，以人類現有的知識與經驗，尚無法有效地衡量。但

註② 詳註③引文：耿慶武（2000），第一部分第四章第一節：「一九七八年以前的大陸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註③ 大陸運用中央政府的強大力量所建立的全國統一的工程、技術、衛生、交通、通訊、電腦、與商品檢驗等制度與規格標準，雖距世界水準仍有一段距離，但畢竟是一有利於大陸十二億的人民經濟發展的制度架構。此一制度上的統一，若其他條件相同，將給予大陸各地區未來的經濟發展較其他較小國家（如韓菲馬泰等）或其他區域市場（如北美自由貿易區、東南亞協約〔ASEAN〕地區、亞太經濟合作〔APEC〕區、歐盟地區等）更多的優勢（較低的交易成本）。吾人可用歐洲聯盟成立所需的時間與成本來類比大陸現今的統一的經濟制度與市場架構的經濟效益。

此並不意味大陸應繼續從事中央集權式的非民主執政方式。事實上，在現今的「政治統一」架構下，在大陸本土，正在自然形成以大城市為核心的九個「大都會經濟圈」。此一經濟區域化的趨勢，將於新世紀初應更加顯著。

在種種相對貧乏的自然資源的限制下，中國大陸能在未來二十年內維持高經濟成長以達成現代化的唯一希望，是在現有的政治與社會結構下，積極厲行市場自由化（Market Deregulation）與經濟區域化（Economic Regionalization）的經濟發展策略。在市場自由化與經濟區域化的過程中，現有的中央集權式領導與決策系統，將自然漸為區域協調與合作的決策方式所取代。因此，大陸未來的政治結構與決策體系，亦將因經濟的自由化與區域化而逐漸趨向地方分權。此種由下而上的決策體系，即使在中國共產黨一黨獨大的政治結構下，亦將可能使中國大陸現有的政治體制「和平演變」為近似現代民主的（Quasi Democratic）或「具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因此同文同種的台灣、香港與澳門以及其他自由世界先進國家，與其消極地靜觀其變，不若積極地有計畫、有目標地參與大陸的經濟區域化過程。外來的經貿、科技、資本與資訊的注入，將加速大陸的經濟自由化與區域化，而終將催化大陸的民主化。

大陸自一九七八年以來的經濟發展策略的特色，是實行了差異性（或歧視性）頗大的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綜觀中國歷史、民族與文化特性、以及自然地理環境的限制，並考慮過去近二十年經濟成長的經驗與區域經濟發展的趨勢，本研究認為大陸未來的經濟成長，極有可能出現以區域經濟圈為「成長極」或成長中心的多頭（多地區）發展趨勢。而一些過去發展期中隱伏性的問題，如自然資源貧乏、區域差異、城（市）鄉（村）差異、流動民工、技術及生產力升級緩慢、企業產權及分配管理的混亂（國營企業問題）、金融體系現代化與資本市場的建立、中央與地方經濟事權的重新分配等，均需靠經濟以外的力量來解決。這些外在經濟（制度）問題（Economic Externality），亦將在未來的大陸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一浮現，甚且變成經濟發展的瓶頸。

（二）大陸形成中的區域經濟圈

中國大陸太大也太複雜，與其將其視為一個「大國家」來分析，不若將其當作一個「小世界」來研究更為適切。中國大陸自一九七八年施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基本上正逐漸形成以大都會及其附近的中小城市群為「成長極」的九至十個擁有相對獨立且產業結構與經濟市場較完整的「大都會經濟圈」。若無重大突發政治事件或天然災害，中國大陸本土境內在新世紀前十至二十年間，應有可能發展形成九個相對上產業結構較獨立和區域市場較完整的大都會經濟圈：吉黑（長春—哈爾濱）、瀋大（瀋陽—大連）、京津冀（北京—天津—石家莊）、濟青（濟南—青島）、長江下游（南京—揚州—合肥）、大上海（上海—吳錫—蘇州—杭州—寧波）、珠江三角洲（廣州—深圳—珠海）、湘鄂贛（武漢—長沙—南昌—九江）和成渝（成都—重慶）^②。此九個大都會經濟圈的主要經濟統計與經濟地理資料，列於表一。

^{註②} 詳註^③引文：王建（1997）及註^④引文：耿慶武（2000b）。

表一 中國大陸九大都會經濟圈的經濟地理 (1996年底)
9 Metropolitan Economies in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1996 Year End)

大都會 經濟圈	人口 ¹ (萬人) Population	佔全大陸 人口比	面積 (萬KM ²)	佔全大陸 面積比率	人均平原 面積 (平方公 尺m ²)	平原佔 全大陸 面積比	主要城市 Major Cities	國內總產值 (1996年 美金億元) ²	佔全大陸 總產值比 (1996年 美金元) ²	人均國內 產值 (1996年 美金元) ²
瀋大	4,116	3.36%	14.6	1.52%	1,214	5.00	0.52% 潑陽 大連	379.99	4.67%	923
京津冀	8,691	7.10%	21.6	2.25%	1,070	9.30	0.97% 京 津 唐 素 石家莊	742.61	9.13%	854
濟青	8,738	7.14%	15.3	1.60%	1,122	9.80	1.02% 濟南 青島 煙台	717.26	8.82%	821
大上海	8,378	6.79%	18.4	1.92%	1,132	10.99	1.15% 滬 蘇 錫 常 寧 杭	1,059.75	13.01%	1,265
珠江三角洲	6,961	5.69%	18.6	1.94%	603	4.20	0.44% 廣州 深圳 珠海 汕頭	784.49	9.65%	1,127
吉黑	6,338	5.18%	65.6	6.83%	3,679	23.32	2.43% 長春 哈爾濱	450.03	5.54%	710
長江下游	8,914	7.28%	19.1	1.99%	807	7.20	0.75% 南京 楊州 合肥	522.34	6.42%	586
湘鄂贛	16,358	13.37%	56.4	5.88%	868	14.20	1.48% 武漢 長沙 南昌	858.56	10.56%	525
成渝	11,430	9.34%	56.7	5.91%	123	1.40	0.15% 成都 重慶	507.22	6.24%	444
沿海五個大都會經濟圈	36,884	30.08%	88.5	9.23%	1,065	39.29	4.10%	3,683.10	45.30%	999
內陸四個大都會經濟圈	43,040	35.17%	197.8	20.61%	1,072	46.12	4.81%	2,338.15	28.75%	543
九個大都會經濟圈	79,924	65.30%	286.3	29.84%	1,069	85.41	8.91%	6,021.25	74.06%	753
全國(大陸)	122,389	99.97% ¹	960.0	100.0%	941	114.98	11.98% ³	8,129.93	100.0%	664

資料來源：耿慶武，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

說明：1.未包含軍隊及不分地區人口在內；

2.一九九六年年中（七月）美元—人民幣匯率為1.00:8.31；

3.總平原面積佔全國總面積百分比。

大陸本土形成中的九個大都會經濟圈在世紀之交，應均已初步建設完成圈內現代化交通網，並且正在或已經發展出較獨立的圈內產業結構的雛型。其圈內的產業結構和區域市場的形成，基本上是過去二十年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下的市場化與城市化的初步結果。此形成中的九個大都會經濟圈中有五個在沿海地區：濱臨渤海的「瀋大」、「京津冀」、與「濟青」所形成的環渤海地區；濱臨東海且橫跨長江與錢塘江三角洲的「大上海」；以及濱臨南海與港澳為鄰的「珠江三角洲」。在大陸內陸中部地區的三個大都會經濟圈中，「吉黑」與韓俄交界；「長江下游」距東海不遠，萬噸級貨輪可達；「湘鄂贛」地處長江中游的大陸中心地帶，為大陸南北交通與長江東西航運的中樞。西部地區僅四川的成都與重慶所結成的工商農產精華區，符合成為大都會經濟圈的條件。

在一九九六年底時，大陸本土形成中的九個大都會經濟圈，共佔中國大陸人口的 65%、平原面積的 74%、和 GDP 的 74%；但是卻吸收了全大陸的固定資產投資的 69%、外國直接投資的 80%，以及創造全大陸進出口貿易額的 84%^②。其中人口最少（四千一百餘萬）且經濟規模次小（佔全國 GDP 的 4.7%）者，是以遼寧地區傳統重工業區為主的「瀋大」經濟圈；最大者為人口超過 1.64 億、經濟規模佔全國 13.4% 位居長江中游的「湘鄂贛」經濟圈；圈內人民最富裕者為「大上海」經濟圈，最窮者為四川的「成渝」經濟圈。這九大經濟區一九九六年的（加權）平均人均 GDP 為美金 753 元，較大陸全國平均人均 GDP（所有省的人均 GDP 的加權平均）美金 664 元高出 13%；較大陸其他地區（省份）的平均人均 GDP（美金 512 元）高出 47%。

九個大都會經濟圈在一九九六年的人均 GDP 自高至低依次為：大上海（美金 1,256 元）、珠江三角洲（美金 1,127 元）、瀋大（美金 923 元）、京津冀（美金 854 元）、濟青（美金 821 元）、吉黑（美金 710 元）、長江下游（美金 586 元）、湘鄂贛（美金 525 元）與成渝（美金 444 元）。其中人口超過 1.6 億與 1.1 億的「湘鄂贛」與「成渝」的人均所得低於全國平均。另外人口近九千萬的「長江下游」因包括人口衆多且較貧窮的安徽及蘇北地區，人均所得亦低於全國平均。

位居沿海的五個大都會經濟圈：濱臨渤海的「瀋大」、「京津冀」與「濟青」（亦濱臨黃海）、濱臨東海的「大上海」、以及濱臨南海的「珠江三角洲」，在一九九六年，共佔中國大陸人口的 30%、平原面積的 34%、固定資產投資的 46% 和 GDP 的 46%；但是卻吸收了全中國大陸的外國直接投資的 67%，以及創造全中國大陸進出口貿易額的 74%。另外四個位居內陸的大都會經濟圈：與俄韓為鄰的「吉黑」、位居中原南部的「湘鄂贛」、位居大陸地理中心但卻在經濟重心以西的「成渝」、以及位於華中卻距海不遠、萬噸級貨輪可達的「長江下游」，共有人口四億三千萬，佔中國大陸人口的 35%、平原面積的 40%、固定資產投資的 23% 和 GDP 的 29%；但卻僅吸收了全中國大陸的外國直接投資的 13%，以及僅參與全大陸進出口貿易活動的 9%。顯而易見的，位於內陸的四個大都會經濟圈經濟發展的較慢，乃因大陸過去「向沿海

註^② 本節所有數據資料均引自表一。

「傾斜」的區域發展政策，使得內陸地區投資較不足、對外開放較晚且幅度較小之故。但此亦意味著在可見的未來該些內陸經濟圈具高速經濟成長的巨大潛力。

中國大陸其他地區中，山西及河南，因地理條件特殊，產業結構的太過單一，且距主要製造業中心過遠，在未來十至二十年間，較難與鄰近地區整合成爲產業結構健全的大都會經濟圈。但河南北部地區應可逐漸融入京津冀大都會圈。內蒙古、陝西、甘肅、寧夏與青海等省的精華區因天然地形的乖隔，且區內主要城市的距離遙遠，因此在二十年內，此五省的市場及產業，甚難發展與整合爲產業結構健全的大經濟圈。但內蒙古東部地區將與東北的二大都會經濟圈較緊密的整合。廣西、雲南及貴州等省的地理條件與經濟結構的分散，使得未來在二十年內，較不易與其他地區，整合爲產業結構健全的大經濟圈。西藏、新疆及海南，因地理條件特殊，在可見的未來，亦無法與任何製造業中心相整合。

未來大陸本土經濟發展的一種非常可能的形態，應將是以九個形成中的大都會經濟圈爲成長極的多元化、分頭並進的區域經濟成長，但各區域的成長速度以及產業與市場的結構並不一定相同。很明顯的，大陸沿海的五個大都會經濟圈將仍是大陸未來經濟的重心，至少在新世紀初年間應有較快的經濟成長。位居內陸的長江下游、中南（湘鄂贛）、成渝（四川）、及東北的吉黑經濟圈的成長速度亦應將較過去大爲提高。未來大陸本土九大經濟圈的成長形態，除了將高速城市化並逐漸建立較獨立且具區域特色的產業結構與市場外，國際化將是每一經濟區共同且無法避免的成長趨勢，雖然各區域國際化的速度與深度將因各區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需要而異。

(三) 兩岸經濟整合之可能：台閩經濟圈的形成

有研究預測在未來二十年內，若政治條件允許，台灣地區的產業與市場將與隔海峽相望的福建地區自然地高度整合，而形成一高度外向形（國際化）的經濟結構²⁴。此一「台閩經濟體」若順利整合成功，則在二〇二〇年時，將超越南韓，成長成爲亞太地區除日本外最大的區域經濟體（請參考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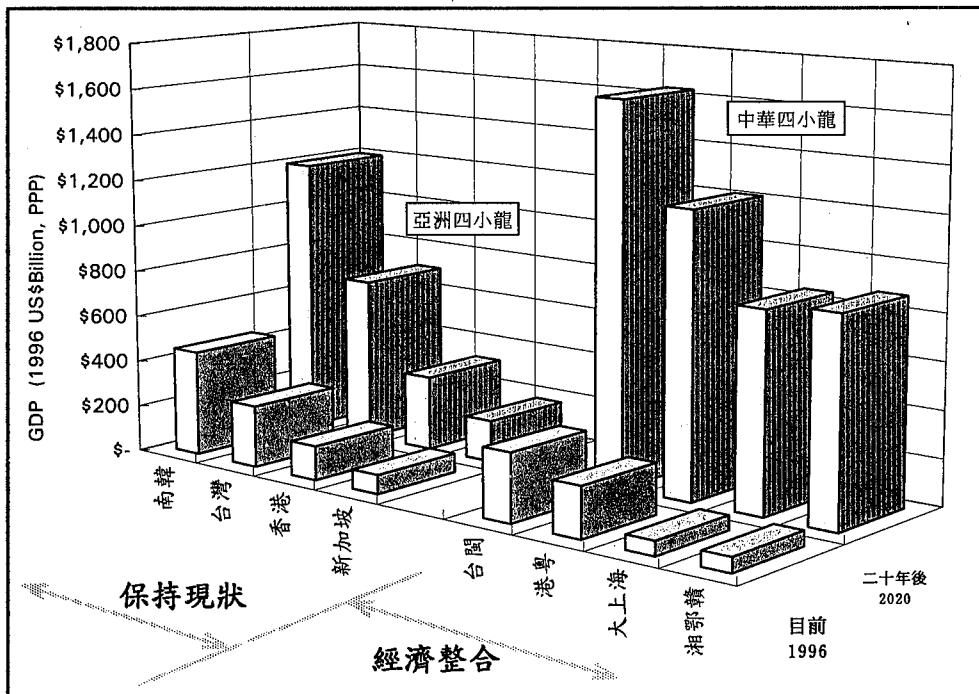
雖然福建因天然地形緣故，甚難與相鄰的浙江、江西、廣東等省的精華區相連接；但卻甚有可能與隔海相望、且科技及製造業發達的台灣，整合成一外向型「台閩經濟圈」。港澳亦甚有可能與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城市整合成另一外向型「港粵經濟圈」。因此，以中國大陸、港澳與台灣所形成的「華人經濟圈」，在未來二十年中，將逐漸發展形成十個以大都會城市爲中心、附近中小城市爲輔的「大都會經濟圈」。這些區域經濟體（Regional Economies）的形成，如作者在註 24 引文中所分析，並不需要任

²⁴ C. W. Kenneth Keng, "China's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Regionalization," in R.E. Bedeski and J. A. Schofield edited,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in the Asia-Pacific Area* (Victoria: Western Geographical Press, 2000), pp.151~178; C. W. Kenneth Keng, "China's Economic Prospects in the New Century," in A. J. Nathan et al edited, *Dilemmas of Reform in Jiang Zemin's China*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pp. 171~212; 及 C. W. Kenneth Keng, "An Economic China: A Win-win Strategy for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5:9, October, 1998, pp. 182~211.

何政治或「主權」的重組，也不需任何文化或意識形態的革命。在兩岸三地現今政治經濟結構下，這些十大區域經濟圈將因區內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遠小於與區外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而自然出現。

當然此一經濟區域化的速度，將隨大陸的各種財經體制的改革、政治控制的減低、資訊的開放、以及兩岸政治對立的緩和的速度而變化。此外，中國大陸國際化的速度與深度，亦將直接與此一經濟區域化趨勢息息相關。美國對大陸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法案的通過與大陸即將成功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之事實，均將於新世紀初年間（二〇〇一～二〇一〇）加速中國大陸的經濟國際化程度。此外，兩岸間預期在二〇〇〇年底前即將開放的「小三通」以及預期稍後開放的「大三通」，亦將使得台灣與福建、廣東的潮州與汕頭地區、以及浙江的南部地區的經濟關係因各種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的大幅下降而加速整合。因此，台閩經濟圈的形成指日可待。

圖一 「中華四小龍」與「亞洲四小龍」的現在和未來



資料來源：耿慶武，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九年）。

五、結語

本文精簡論述未來中國大陸的區域經濟發展趨勢。大陸自一九七八年以來的經濟發展策略的特色，是實行了差異性（或歧視性）頗大的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綜觀中國

歷史、民族與文化特性、以及自然地理環境的限制，並考慮過去近二十年經濟成長的經驗與區域經濟發展的趨勢，本研究認為大陸未來的經濟成長，極有可能出現以區域經濟圈為「成長極」的多頭（多地區）發展趨勢^②。而一些過去發展期中隱伏性的問題，如自然資源貧乏、區域差異、城（市）鄉（村）差異、流動民工、技術及生產力升級緩慢、企業產權及分配管理的混亂（國營企業問題）、金融體系現代化與資本市場的建立、中央與地方經濟事權的重新分配等，均需靠經濟以外的力量來解決。這些外在經濟（制度）問題（Economic Externality），亦將在未來的大陸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一浮現，甚且變成經濟發展的瓶頸。

未來大陸經濟發展將受人口、平原面積、糧食、能源及生態的嚴厲限制，因此區域經濟發展策略的制定，必得考慮實際經濟及地理條件的因素。「大都會經濟圈」區域經濟發展策略為大陸未來的經濟發展提供一較務實可行、且較樂觀的經濟發展方向；但其成功的基礎及形成的速度，卻仍將建立在未來大陸政治及社會發展的結果上。然而，大陸在未來出現高度城市化的都會經濟圈，畢竟將為一非常自然及可能的經濟發展趨勢。因應該趨勢，大陸當局在未來制定及施行大都會經濟圈發展策略，似比其他區域發展策略較有可能及較為可行。如此，非但可集約利用大陸相對貧乏的自然資源，更可有效地利用發展一些區域所累積的人才、知識與經驗，逐步地去發展其他尚未發展的區域。此種因實際需要而訂定的區域發展次序，非但可優化經濟資源的利用，更可享受規模經濟之利。因為以大陸市場規模之大，若同時齊頭發展所有區域，將因各區域在資本市場上的競爭所造成的投資沖銷效果，以及實物市場上的需求劇增所引起的通貨膨脹，都將造成無法解決的經濟發展瓶頸，破壞或扭曲市場秩序，而終將迫使大陸經濟規劃者，不得不回到逐步且漸進式的、以市場需求來決定優先次序的、分段的、分層次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

齊頭式的全面「自由化」，只會在根本不具備自由市場機能的大陸衆多且相對的較獨立的經濟區域，造成資源的惡性競爭。此非但無法將資源分配到最需要處，反而造成呆滯、浪費、及極不協調的地區及產業的畸形發展。因而終將導致經濟供需由地區性的失調，而引起的全面性的無法協調，最後造成實物市場及資金市場均供需失調的通貨膨脹。大陸過去二次以總體性的「解禁」政策，以及中央向地方全面「放權讓利」所造成的「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慘痛經驗，以及蘇聯解體後迄今的經濟混亂，基本上均是因市場制度未建立即全面解禁的結果。因此分階段、分層次、且以市場力量推動的區域經濟發展政策，應是大陸未來經濟發展的最佳策略與最可行方式，也是大陸未來在各種主客觀條件限制下，最有可能的經濟發展趨勢。

本文因篇幅限制，較偏重以「市場經濟」來分析與預測大陸未來經濟發展趨勢與

^② 關於中國大陸經濟區域的劃分方式與發展階段，已於作者所著之下列論文中詳細分析，因篇幅所限，不再在本文中重述。C. W. Kenneth Keng, "China's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Regionalization," in R. E. Bedeski and J. A. Schofield edited,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in the Asia-Pacific Area* (Victoria: Western Geographical Press, 2000), pp. 151~178; 及耿慶武，「中國大陸經濟區域的劃分及發展趨勢」，前引文。

形態，而未能較仔細自「政治經濟學」角度來研討大陸政府政策對大陸區域經濟蓬勃的發展的深遠影響，因此或有過分「理想化」之虞。中國大陸過去二十年間中央政府正確的（或較少誤失的）「改革開放」與「梯度開發」政策是大陸經濟蓬勃發展的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該些體制改革與區域開發政策基本上為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建立了不可或缺的近似現代化的制度基礎（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②。但是，造成大陸過去二十年經濟蓬勃發展的主導條件（即理則學上所謂的充分條件 Sufficient Condition），卻非「市場經濟」莫屬。事實上大陸體制改革策略的唯一目標就是在大陸建立以自由市場機制為主的「市場經濟」。就方法論而言，該二條件俱可為大陸經濟蓬勃發展的主要因素，一條件的成立並不否定或排斥另一條件的存在。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新古典經濟成長理論（Neoclassic Economic Growth Theory）以及過去十數年間發展成熟的內生成長理論（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可直接協助吾人有效分析與預測大陸過去與未來的長期經濟發展趨勢^③。

大陸當局最近提出的發展大西北策略，應並不是盲目且立即不計成本的全面開發幅員廣大的西北地區的經濟，而是一長時期以利用外資與民間資本為主的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並重的總體區域均衡發展策略。發展大西北策略的終極效益，應不全然在於積極發展該地區的經濟，而亦有藉保護該地區的自然生態，以保全未來中國大陸中部與東部的生態環境。因為中國大陸絕大部份主要河流發源於西北地區。而水資源在世紀之交，已經成為大陸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之一。

中國大陸既然已經有五十年（一九四九～一九九九）的「統一」歷史，而且已經發展出有利現代經濟發展的統一語文、單一貨幣、關稅、財政、法律、教育等制度與系統，以及各種技術性的規格與標準，實際上已經建立了有利於現代經濟發展的基本制度架構（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破除此一架構的經濟成本及對大陸的十二億華人的精神與社會損失，以人類現有的知識與經驗，尚無法有效地衡量。但此並不意味大陸應繼續從事中央集權式的非民主執政方式。事實上，在現今的「政治統一」架構下，在大陸本土，正在自然形成以大城市為核心的九個「大都會經濟圈」。此一經濟區域化的趨勢，應將於新世紀初更加顯著。

* * *

註^② 有興趣讀者或可參考：耿慶武著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九年）的第一部份：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策略研究（共六章）。該部份較仔細討論與分析大陸過去與未來的區域經濟發展政策。

註^③ 見本文第二節與第三節前部，以及 D. Ray, *Development Econom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apter 3 and Chapter 4, pp. 47~132.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 W. Kenneth Keng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rn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ories are first concisely summarized and the emerging regional economies in China are described. After reviewing China's major development policies towards regionalization and by investigating results from existing literature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es,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re will be nine metropolitan economies with relative independent industrial and market structures emerging in Mainland China. Being China's future growth poles, these metropolis as will lead the Chinese economy into an age of pluralistic economic growth. China's neighboring economies of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o may largely benefit from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China's economic regionalization. Two companion papers provide quantitative analyses with detailed statistical data to support views suggest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Chinese economy; Regionalization;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ory; Metropolitan economies